

中国民众捐赠行为的变迁： 基于年龄 - 时期 - 世代效应分析(2010—2022)*

王林欣 林 靛 寇 彧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心理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摘要:捐赠行为是典型的亲社会行为,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本。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2年的七期成人和家庭经济问卷数据,采用分层交叉年龄 - 时期 - 世代分析,考察我国民众捐赠行为的动态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捐赠行为在年龄上呈倒“J”型趋势;(2)在控制个体层面变量后,时期效应显示,捐赠行为在2010—2020年间呈“U”型趋势,于2022年有所下滑;(3)世代效应表明,在1912—2002年出生的世代群体中,1912—1926和1978—1984年间出生的世代分别处于捐赠高峰,而1958—1961年间出生的世代处于低谷,1985—1991年和1992—2002年间出生世代的捐赠行为有所回落。

关键词:捐赠行为;社会变迁;生命历程;年龄 - 时期 - 世代效应

分类号:B844

1 引言

捐赠行为指人们自愿捐赠金钱、物品或时间给有需要的个人、群体或机构的亲社会行为(柳建坤,张云亮,2021)。捐赠行为可依据捐赠者的属性划分为个人捐赠、企业捐赠和其他捐赠。个人捐赠以个人或者个人所属的家庭为捐赠主体,企业捐赠以企业为捐赠主体,其他捐赠则以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为捐赠主体(杨团,朱健刚,2022)。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论文化或社会制度如何,捐赠行为普遍存在。就我国而言,中华传统文化蕴含“达则兼济天下”、“矜贫救厄”和“振穷恤寡”等民本福利思想和亲社会理念,尤其倡导慈善捐赠。慈善捐赠作为社会收入分配体系中的第三次分配方式,通过资源再分配,为弱势群体提供资金和机会,因此在推动中国共同富裕进程、减少社会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亦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根据《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3)》,截至2022年底,我国共有89.13万个慈善组织机构,社会捐赠的总金额达到1400亿元。尽管我国社会捐赠金额总体上呈稳步增长趋势,但在捐赠金额和个人捐赠占比方面,与其他慈善事业更成熟的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2020年,我国社会捐赠主体仍以企业为

主(占比约70.66%),个人捐赠总额为385亿元,占比25.13%,而同年美国个人捐赠总额为3241亿美元,占比68.75%(Giving USA Foundation, 2021; 杨团,朱健刚,2022)。相比于企业捐赠,个人捐赠行为更能反映社会民众对公共事务的责任和关注,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和扶助,构成了全社会慈善事业的微观基础。

捐赠行为变化规律的研究可从微观层面的个体发展与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两个层面展开。过往研究多从微观层面探究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聚焦于捐赠者(如,年龄、社会阶层、成长经历、心理获益、财经素养)(Ferguson et al., 2023; Gong et al., 2019; Piff et al., 2010; 辛志勇等, 2023)、受赠者(如,与捐赠者的关联、是否为弱势群体)(Bednall et al., 2013; 钟毅平等, 2015)和所处环境(如,社会规范、经济发展、特定历史事件或自然事件等)(Côté et al., 2015; Everett et al., 2015; 柳建坤,张云亮,2021)三大因素。然而,鲜有研究在宏观层面考察中国民众捐赠行为的社会变迁与影响因素。社会变迁涉及年龄、时期、世代三个时间效应(蔡华俭等, 2020; 王俊秀,刘洋洋,2023)。在年龄效应方面,过往研究通过比较不同年龄群体的捐赠行为发现,随着年龄增长,个体的捐赠行为呈上升趋势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2471122)。

通讯作者:寇彧, E-mail: kouyu@bnu.edu.cn

(Freund & Blanchard - Fields, 2014; Romano et al., 2021)。在时期效应方面,Chen 和 Yang (2024)通过跨时间比较发现,中国民众的亲社会态度、倾向与行为在2010—2018年期间呈现出先衰退后复苏的发展模式。在世代效应方面, Twenge 等人(2012)通过跨代际比较发现,美国婴儿潮一代(出生于1946年至1961年)、X一代(出生于1962年至1981年)和千禧一代(出生于1982年之后)的捐赠行为存在代际差异,总体呈现随世代更替而下降的趋势。然而,由于方法的局限性,过往研究未能有效区分年龄效应(即,个体所处生命周期的影响)、时期效应(即,当下社会环境变化对民众的整体影响)和世代效应(即,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对同一世代的影响),其结果是多种效应的混合(蔡华俭等,2020)。

捐赠行为及其社会规范会随着时期和世代的演变而发生变化(南锐,汪大海,2013;杨永娇等,2019)。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经历了经济改革、城市化进程、教育体制改革等多方面的社会变革,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会阶层差距扩大、经济不平等加剧等诸多问题(Xie & Zhou, 2014),这些因素也可能影响个体的行为变化(Yang & Konrath, 2023)。截至目前,尚未有研究以动态视角考察我国民众捐赠行为的社会变迁历程。生命历程理论(Alwin & McCammon, 2003; Elder, 1999)指出,社会变迁是个体生命和时代变化相结合的结果,研究需要同时考虑个体、社会和历史层面。因此,在探讨捐赠行为的社会变迁时,不仅要考虑不同时期下的个体行为变化,也必须考虑到时代变迁所嵌套的个体年龄与世代的差异。鉴于此,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10—2022年的七期成人和家庭经济问卷数据,采用分层交叉年龄-时期-世代分析,考察我国民众捐赠行为的年龄特征、时期变化和世代差异,从而描绘我国民众整体捐赠行为的变化趋势。揭示社会变迁下中国民众捐赠行为的演变规律有助于厘清影响捐赠行为的内在因素与外部动因,为促进民众关心公共事务、关爱弱势群体、参与第三次分配提供重要参考。

1.1 捐赠行为的年龄效应

年龄效应是指个体自身所处的生命周期的影响,反映了与年龄相关的生理或心理因素,以及社会身份转变等内部力量的作用。根据生命历程理论,个体的社会角色、资源、权利与责任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转变,其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也会因此有所

不同(Settersten Jr, 2003)。即使在相同的时期,处于生命历程不同阶段的个体,其捐赠行为也可能存在差异。有关亲社会行为生命周期的两个竞争性假说为解释捐赠行为的年龄效应提供了理论支持。根据亲社会增长假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亲社会性会不断提高,更愿意从事捐赠行为(Romano et al., 2021; Van Lange et al., 1997)。研究者认为,年轻人通常面临着家庭和事业上的经济压力,财务需求更为紧迫,因此资源积累对他们尤为重要(Freund & Riediger, 2001)。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逐渐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资源,经济上更加宽裕,更有能力回馈社会。因此,老年人的捐赠意愿高于年轻人(de Bruin et al., 2021; Mayr & Freund, 2020)。例如, Freund 和 Blanchard - Fields(2014)发现,对于自身获得价值5瑞士法郎的亚马逊礼品卡,还是由主办方把5瑞士法郎捐赠给慈善组织的决策,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将资金捐赠给慈善组织。与之相对,亲自我增长假说认为,老年人由于更关注自身安全,倾向于保留有限资源而非分享,因此更少从事捐赠行为(Romano et al., 2021; Van Lange et al., 1997)。Gong 等人(2019)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年轻人,老年人对陌生人的慷慨程度更低,更不愿意捐赠自己的金钱和时间(如,参加志愿活动)。中国公众捐赠调研报告提供了相似的证据,年轻人相较于老年人的捐赠行为更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23)。

除年龄外,社会经济地位也被证实会影响个体的捐赠行为(Andreoni et al., 2021; Schulreich et al., 2023)。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多维度指标,包括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如,受教育程度、收入和工作状况)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Piff et al., 2010)。相对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高社会经济地位者通常拥有更多的财富和资源,具备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因此更容易承担捐赠的经济负担。例如, Schmukle 等人(2019)基于美国消费者支出调查的全国代表性样本发现,收入高的家庭,慈善捐赠的金额往往也更高。

1.2 捐赠行为的时期效应

时期效应反映了调查时期当下的社会经济发展、重大社会事件或科技进步等对民众的整体影响,受外部因素主导。基于生命历程理论,捐赠行为的时期效应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时期内,由于外部环境的作用,不同年龄和世代的人群在捐赠行为上表现出的共性(Elder et al., 2003)。例如,自然灾害或

全球性疫情等重大社会事件可能会在短期内激发公众的捐赠热情,而慈善政策的调整或社会责任意识的提升也可能在更长时间内塑造捐赠行为的普遍趋势。无论年龄或世代如何,在相同时期中,个体的捐赠行为往往会受到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从而表现出一定的时期特征。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10—2022 年间,中国逐渐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全面脱贫,我国民众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都表现出明显的时期差异。例如,胡洁(2020)通过对比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05 年和 2015 年的数据发现,我国民众对包括陌生人在内的一般信任呈上升趋势,而对基于亲缘、宗族、乡亲关系的特殊信任呈下降趋势。颜志强等人(2017)探究了大学生共情的时期效应,结果显示,2009—2015 年间大学生的共情水平逐年升高。

过往研究多从横断历史元分析和横断历史调查比较的视角,探讨了信任、合作行为、亲社会行为等与捐赠行为密切相关的特质或行为的社会变迁(Chen & Yang, 2024; 辛自强, 2019; 苑明亮等, 2024)。例如,苑明亮等人(2024)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揭示中国人在 1999—2019 期间与陌生人的合作行为呈上升趋势。然而,对于捐赠行为的具体发展趋势,现有研究仍显不足。据《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3)》显示,我国 2022 年社会捐助金额为 1400 亿元,较 2010 年增长了 100%。然而,该结果受捐赠者年龄和世代效应的影响,并不能完全反映捐赠行为在时期维度上的净趋势(Yang & Land, 2006, 2013)。若想真正揭示我国民众捐赠行为在时期维度上的发展趋势,需要剥离混杂在其中的年龄和世代效应。

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等通常在时期维度上影响个体的捐赠行为。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民众往往更愿意慷慨解囊,做出更多捐赠行为(Bielefeld et al., 2005)。然而,过往有关经济不平等和捐赠行为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一方面,经济不平等拉大了个体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可能加剧了不同财富群体之间的关系对立与恶化(Schröder & Neumayr, 2023),导致群体凝聚力和人际信任下滑,最终降低个体从事捐赠行为的意愿(Duquette, 2018)。另一方面,根据不纯粹利他主义模型(Andreoni, 1990),个体在从事捐赠行为时不仅能感受到温暖(即,温情效应),还会关注捐赠行为是否能够真正发挥预期作用。在此基础上,不平等厌恶假

说进一步提出,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可能会提高捐赠者的感知效用,使其认为自身的捐赠行为具有更高的社会价值(Mastromatteo & Russo, 2017; Schröder & Neumayr, 2023; Yang & Konrath, 2023)。因此,人们在经济不平等时期更愿意积极参与捐赠行为(Fehr & Schmidt, 1999; Yang & Konrath, 2023),以促进第三次分配。基于此,为了更全面地考察捐赠行为在时期维度上的趋势,本研究也关注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量(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与基尼系数为代表的外部宏观经济因素与捐赠行为的关系,以分析描述我国特定时期个人捐赠行为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3 捐赠行为的世代效应

世代效应是指同一出生年代的人群,在相似生命阶段受到了共同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的影响,受内外部因素的交互影响(Yang, 2008; 李婷等, 2020)。捐赠行为的世代差异反映了不同世代在其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其捐赠行为的影响。基于生命历程理论(Alwin & McCammon, 2003; Elder, 1994),各个年代独特的社会背景和历史事件塑造了不同世代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使他们有别于其长辈或子代。在西方社会历史背景下,美国婴儿潮一代(1945—1960 年出生)的幸福感知低于上一世代和下一世代(Yang, 2008)。此外,Twenge 等人(2012)基于美国全国代表性样本发现,相比于婴儿潮一代和 X 一代,千禧一代更倾向于追求外在目标(如金钱、名誉),而捐赠行为相对较少。

与西方国家的发展轨迹不同,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历史事件,这些变革深刻地塑造了不同世代中国民众独特的生活体验和社会认知。在制度方面,中国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转变。这期间发生了许多历史事件,例如,战乱年代(1949 年之前)、新中国成立(1949 年)、三年困难时期(1958—1961 年)、文化大革命年代(1967—1977 年)以及改革开放时代(1978 年以后)。这些鲜明的历史特征和社会发展特点,对不同世代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都会产生深刻影响。过往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世代,改革开放世代的人际信任水平更高(Hu, 2015),更加尊重权威且私人领域价值观更开放(高海燕等, 2022);而三年困难时期世代感知到的公平感较低(王俊秀, 刘洋洋, 2023)。Wu 等人(2023)探究了自我实现(如,自主、责任心)、生存安全(如,努力工作、节俭)和他人导

向的价值观(如,慷慨、尊重他人)在中国不同世代中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世代和独生子女世代有着更高的自我实现和生存安全的价值观,而他人导向的价值观不存在世代差异。基于此,探讨中国民众捐赠行为在社会变迁下的变化趋势时,需考虑中国特有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并从生命历程的视角解释社会变迁对不同世代的影响。在世代划分问题上,西方研究者多采用“三年一代”或“五年一代”的划分方法,考虑到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独特性,这种平均划分世代的方法可能无法将我国特有历史事件和对应出生世代相结合。因此,本研究遵循 Jiang 等人(2020)的建议,将中国近现代历史重大事件发生的年代与对应出生世代相结合,作为世代的分界点。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生命历程理论,通过整合多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分层交叉年龄-时期-世代分析的方法,探究中国民众捐赠行为在年龄、时期、世代维度上的变化趋势,并结合社会宏观因素和历史事件对捐赠行为的社会变迁趋势进行描述和解释,以期回答中国民众捐赠行为“怎么变”的问题(蔡华俭等,2023),并为解释“为什么变”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2010、2012、2014、2016、2018、2020和2022年的成人和家庭经济问卷数据,探索我国民众捐赠行为的社会变迁。CFPS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起,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的追踪调查项目,旨在反映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心态、行为等变化,样本覆盖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自2010年首次开展全国抽样调查以来,该项目以每两年一次的频率持续进行。本研究选取了1912—2002年出生的个体为样本,经过例删法处理关键变量的缺失数据后,最终获有效样本为76377人(18~100岁, $M_{age} = 52.85$ 岁, $SD = 16.41$),其中男性42094人,女性34283人。

2.2 变量测量

本研究核心因变量为我国民众的捐赠行为。CFPS在2010年测量捐赠行为的问题为“去年捐赠的钱物总价值约合多少元?”2012—2022年测量捐赠行为的问题均为“过去一年,您家社会捐助支出(包括现金和实物,如食品、衣服等)是多少?”。本研究的时间自变量为年龄、观测时期(2010、2012、

2014、2016、2018、2020、2022)和出生世代(最早1912年出生,最晚2002年出生)。依据中国特有历史时期,并参照以往研究(Jiang,2020),本研究将出生世代划分为10组:军阀混战时期出生世代(1912—1926)、十年内战时期出生世代(1927—1936)、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出生世代(1937—194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生世代(1950—1957)、三年困难时期出生世代(1958—1961)、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出生世代(1962—1966)、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生世代(1967—1977)、改革开放初期出生世代(1978—1984)、市场化初探时期出生世代(1985—1991)和市场经济改革时期出生世代(1992—2002)。

余下自变量的选取,依据CFPS七期测量的调查数据,划分为人口学变量(性别、城乡、婚姻状况)、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工作状况、主观社会地位)和时期的宏观变量(人均GDP增量、基尼系数和人口自然增长率)。GDP数据与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官网,基尼系数(0~1,0=完全平等,1=完全不平等)来源于《中国住户调查年鉴》。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详见表1。在数据分析过程中,为了减少模型中异方差性,本研究对捐赠行为、家庭收入和人均GDP增量进行对数转换。由于捐赠行为和家庭收入存在较多数值为0的情况,本研究先对原始数值加一,再进行对数转换。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i>M</i>	<i>SD</i>	最小值	最大值
捐赠行为(元)	116.28	1327.23	0.00	20000.00
年龄	52.85	16.41	18.00	100.00
性别	0.55	0.50	0.00	1.00
城乡	0.50	0.50	0.00	1.00
婚姻状况	0.85	0.36	0.00	1.00
受教育程度	2.80	1.40	1.00	7.00
家庭年收入(元)	68369.84	165152.61	0.00	11387796.00
工作状况	0.71	0.45	0.00	1.00
主观社会地位	2.92	1.06	1.00	5.00
人均GDP增量(元)	52053.11	13449.08	30807.00	71827.00
基尼系数	0.47	0.01	0.46	0.48
人口自然增长率(%)	0.43	0.30	-0.06	0.74

注:性别:0=女,1=男;城乡:0=乡村,1=城市;婚姻状况:0=非在婚(含未婚、离婚、丧偶、同居),1=在婚;受教育程度:1=小学以下,2=小学,3=初中,4=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5=大专,6=大学本科,7=硕士及以上;工作状况:0=否,1=是;主观社会地位:1=很低,5=很高。

2.3 研究方法

鉴于年龄、时期、世代存在完全线性关系(世代 = 时期 - 年龄),普通的线性模型无法有效处理并获得唯一解。为解决年龄 - 时期 - 世代(Age - Period - Cohort, APC)中三个维度的共线性问题, Yang 和 Land(2006, 2013)提出分层 APC 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Hierarchical APC - Cross - 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s, HAPC - CCREM),将年龄设定为第一层变量(即,固定效应),将时期和世代设定为第二层变量(即,随机效应),以打破三者的共线关系。该方法的有效性已在过往研究中得到证实(李婷, 2018; 王俊秀, 刘洋洋, 2023)。

第一层模型: $Y_{ijk} = \beta_{0jk} + \beta_1 \text{Age}_{ijk} + \beta_2 \text{Age}_{ijk}^2 + \beta_3 X_{ijk} + \varepsilon_{ijk}$, $\varepsilon_{ijk} \sim N(0, \sigma^2)$

其中, Y_{ijk} 指因变量在时期 j 和世代 k 中个体 i 的取值; X 为个体层面除年龄外的所有自变量; β 为回归系数。具体而言, β_{0jk} 表示在时期 j 和世代 k 中的随机截距项; β_1 和 β_2 分别表示年龄和年龄平方的固定系数; β_3 表示其他个体层面变量的固定系数; ε_{ijk} 表示模型中的随机误差,服从均值为 0 方差为 σ^2 的正态分布。

第二层模型: $\beta_{0jk} = \gamma_0 + \mu_{0j} + \nu_{0k} + \beta_{01} \text{GDP} + \beta_{02} \text{Gini} + \beta_{03} \text{Population}$, $\mu_{0j} \sim N(0, \varepsilon_u)$, $\nu_{0k} \sim N(0, \varepsilon_v)$

综合模型: $Y_{ijk} = \gamma_0 + \beta_1 \text{Age}_{ijk} + \beta_2 \text{Age}_{ijk}^2 + \beta_3 X_{ijk} + \mu_{0j} + \nu_{0k} + \beta_{01} \text{GDP} + \beta_{02} \text{Gini} + \beta_{03} \text{Population} + \varepsilon_{ijk}$

其中, γ_0 表示截距项的固定效应,即在整个数据集中所有时期和世代的平均截距; μ_{0j} 表示时期 j 的随机效应,服从均值为 0, 方差为 ε_u 的分布; ν_{0k} 表示世代 k 的随机效应,符合均值为 0, 方差为 ε_v 的分布; β_{01} 、 β_{02} 和 β_{03} 分别表示时期变量的人均 GDP 增量、基尼系数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对随机截距项的作用。

2.4 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 SAS 9.4 进行分层 APC 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模型 1 仅纳入年龄、年龄平方、时期和世代,获得捐赠行为在三个时间维度上的净效应。模型 2 纳入人口学变量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探究捐赠行为的时期和世代效应是否与上述个体层面变量存在关联。在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后,模型 3 探究时期层面的宏观经济变量(即,人均 GDP 增量和基尼系数)是否会预测捐赠行为在时期维度的差异。

此外,考虑到 2010 年题目与其余年份题目在表述上并非完全一致,本研究将 2010 年数据剔除后,重复进行上述分析,研究结果见附表 1 与附图 1 -

3。为了提高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研究将因变量转换为二元变量(1 = 做出捐赠行为, 0 = 未做出捐赠行为),并在 2010—2022 年的 7 期数据上重复上述分析流程,研究结果见附表 2 与附图 4 - 6(补充材料见 Open Science Framework: <https://osf.io/2zw3f/>,下同)。

3 结果

分层 APC 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结果如表 2 所示。在模型 1 - 3 中,固定效应的年龄和年龄的平方均显著预测捐赠行为,捐赠行为与年龄之间呈现倒“J”型关系(图 1)。从 18 岁开始,我国民众的捐赠行为随着年龄的增大逐渐上升,于 41 ~ 50 岁达到顶峰,随后逐渐下降。在模型 1 中,世代效应和时期效应趋势显著。在控制了年龄和时期效应后,捐赠行为的出生世代走势如图 2a 所示,在 1912—1926 世代和 1985—1991 世代呈现两个高峰,在 1950—1966 世代呈现趋于低谷态势,改革开放初期 1978—1984 世代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市场化初探时期 1985—1991 世代和市场经济改革时期 1992—2002 世代又有回落。图 3a 呈现了在控制了年龄和世代效应后,捐赠行为的时期波动走势。捐赠行为在 2010—2020 年间呈“U”型趋势,于 2022 年有所下滑。

模型 2 表明,性别与捐赠行为负相关($\beta = -0.01, p < 0.001$),而城乡($\beta = 0.09, p < 0.001$)和婚姻状况($\beta = 0.02, p < 0.001$)与捐赠行为正相关。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受教育程度($\beta = 0.21, p < 0.001$)、家庭收入($\beta = 0.08, p < 0.001$)、工作情况($\beta = 0.04, p < 0.001$)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beta = 0.04, p < 0.001$)均与捐赠行为正相关。模型 2 中加入的个体层面变量后,捐赠行为的时期趋势未发生显著变化。然而,在纳入人口学变量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后,世代效应虽依旧显著,但走势发生了变化,如图 2b 所示,捐赠行为的最低点由 1950—1966 年间出生的三个世代变为 1958—1961 出生世代,而这个时间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在模型 3 中加入时期层面的三个变量后,结果显示,只有基尼系数($\beta = 0.12, p = 0.001$)与捐赠行为正相关。在随机效应方差上,时期效应的 p 值从 0.042 上升为 0.112,如图 3b 所示,时期效应的趋势趋于平坦。此外,补充分析的结果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具体结果见附表 1 与附图 1 - 3,以及附表 2 与附图 4 - 6)。

表2 分层 APC 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对中国民众捐赠行为的主要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1(N = 76377)		模型 2(N = 76377)		模型 3(N = 76377)	
	估计值	p	估计值	p	估计值	p
个体层面变量						
年龄	0.42	< 0.001	0.41	< 0.001	0.41	< 0.001
年龄 ²	-0.50	< 0.001	-0.38	< 0.001	-0.38	< 0.001
性别			-0.01	< 0.001	-0.01	< 0.001
城乡			0.09	< 0.001	0.09	< 0.001
婚姻状况			0.02	< 0.001	0.02	< 0.001
受教育程度			0.21	< 0.001	0.21	< 0.001
家庭收入			0.08	< 0.001	0.08	< 0.001
工作情况			0.04	< 0.001	0.04	< 0.001
主观社会地位			0.04	< 0.001	0.04	< 0.001
宏观层面变量						
人均 GDP 增量					-0.05	0.187
基尼系数					0.12	0.001
人口自然增长率					-0.06	0.094
随机效应方差						
时期						
截距	0.03	0.042	0.03	0.042	0.01	0.112
世代						
截距	0.02	0.024	0.01	0.024	0.01	0.025
拟合程度						
AIC	213697		207717		207722	
BIC	213690		207711		207716	

注:固定效应的估计值均为标准化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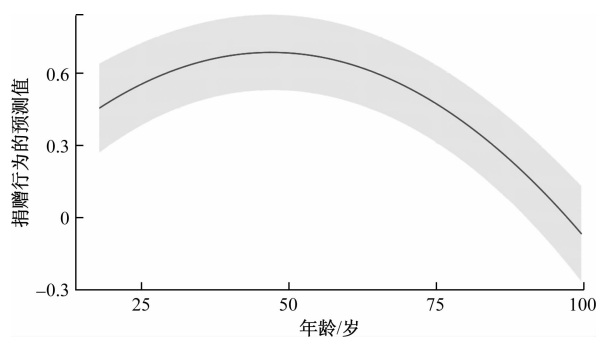


图1 捐赠行为的年龄趋势

(纵坐标为对数转换后的捐赠行为的预测值;
阴影为95%置信区间,下同)

4 讨论

中国民众捐赠行为是否随着社会变迁发生了变化?不同年龄群体、不同世代的捐赠行为是否有差异,这些差异与何有关?为了探讨上述问题,

本研究基于 CFPS 数据库中 2010—2022 一共七期跨度十二年的调查数据,采用分层 APC 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以动态视角考察了中国民众捐赠行为的变迁历程,并勾勒出捐赠行为在年龄、时期和世代上的变化趋势。首先,捐赠行为在年龄上呈倒“J”型趋势,于 41~50 岁到达顶峰。其次,我国民众的捐赠行为在 2010—2020 年间呈“U”型走势,于 2022 年有所下滑。在纳入宏观层面变量后,时期效应的走势趋于平坦。最后,在控制一系列人口学变量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后,捐赠行为在 1912 年至 2002 年出生的十个世代群体中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本研究基于生命历程理论,首次探讨了我国民众捐赠行为在年龄维度、时期维度和世代维度的发展变化,从长程时间跨度的视角考察了捐赠行为的动态变迁趋势,并探究了微观个人特征、宏观社会经济环境和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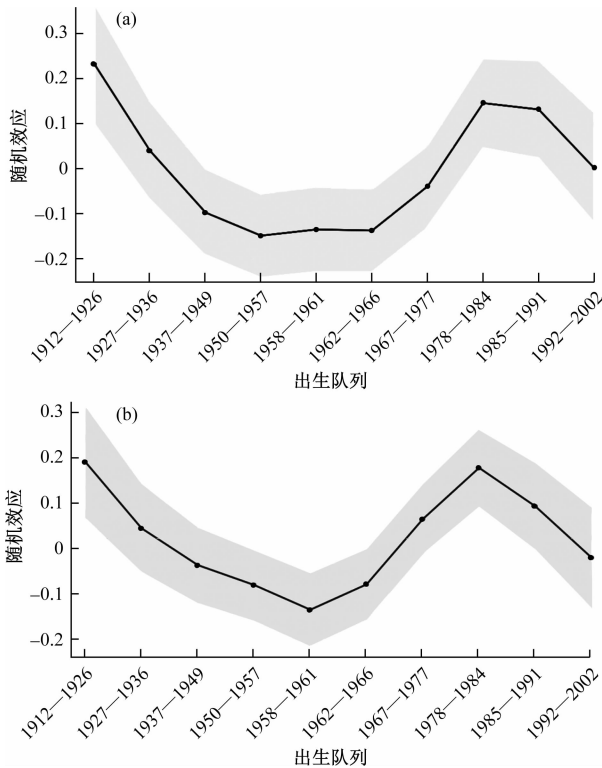


图2 (a)模型1中捐赠行为的净世代效应趋势;(b)模型2中纳入人口学变量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后捐赠行为的世代效应趋势^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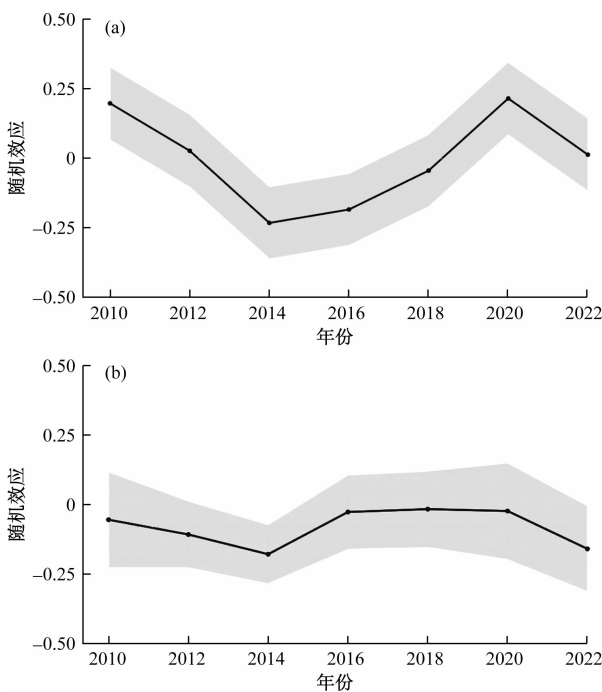


图3 (a)模型1中捐赠行为的净时期效应趋势;(b)模型3中纳入人均GDP增量、基尼系数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后捐赠行为的时期效应趋势

史事件等因素对捐赠行为的潜在作用。

4.1 捐赠行为的年龄效应

本研究发现,与亲社会增长假说和亲自我增长假说提出的线性关系不同,我国民众捐赠行为在年龄上呈倒“J”型的非线性关系。在分离了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后,捐赠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从18岁开始呈现先快速上升,在41~50岁达到顶峰,随后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与过往国外的研究结论不完全一致(de Bruin et al., 2021; Mayr & Freund, 2020),但与我国的相关调查结果具有一致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23)。这可能预示着捐赠行为的年龄效应存在文化差异。在中国,老年人相比年轻人和中年人表现出较低的捐赠行为。对于刚刚步入成年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可能面临着积累财富、建立自己小家庭和建立社会认同感的艰巨任务(Mayr & Freund, 2020)。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一方面社会责任感逐渐增强,另一方面也逐步积累了一定的资源,因此捐赠行为呈现出上升趋势,并在中年阶段达到顶峰。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亲社会增长假说。然而,在50至60岁这一年龄段,个体开始步入退休阶段。退休通常伴随着主要收入的减少及来源的改变,人们更多依赖养老金或储蓄生活,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捐赠行为(Midlarsky & Hannah, 1989)。对于中国民众而言,这一现象可能还反映了中国文化“家本位”思想的影响。中国老年人通常将家庭和子女视为生命的重心,认为自己有责任为后代积攒财富,并提供财务帮助和支持(Gong et al., 2019; Midlarsky & Hannah, 1989)。相对于向外人捐赠,将金钱留给家庭后代更符合中国文化特征。此外,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即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会基于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而不同(费孝通, 2019)。与非亲属相比,老年人会对亲属,尤其是自己家庭的后代更加慷慨和偏爱,在金钱捐赠上表现出更高的亲缘偏好(Gong et al., 2019)。因此,捐赠行为的年龄效应呈现出倒“J”型走势。相比于以往有关年龄和捐赠行为简单线性关系的研究,本研究基于我国代表性的大样本群体,在剥离了时期和世代的潜在影响后,更全面准确地描绘了捐赠行为在不同年龄段的变化模式,为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是否工作和主观社会地位同样是与民众捐赠行为密

① 纳入人口学变量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后,世代效应依旧显著,其最低点由1950—1966年间出生的三个世代变为1958—1961年出生世代。

切相关的微观因素,这些发现与过往研究相一致(Schulreich et al., 2023)。就效应值而言,受教育程度对个体捐赠行为的解释力度最大,家庭年收入次之。该结果印证过往研究,表明相较于经济因素,教育因素更能促进民众的捐赠行为(Lin et al., 2023; 朱健刚, 刘艺非, 2017)。这可能是由于受教育水平高的个体持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利他意识。概言之,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个体通常拥有更多的时间、金钱和更强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他们更有能力承担捐赠带来的经济负担,也更容易将一部分财富用于捐赠行为。基于再分配规范,社会也普遍期望高社会经济地位者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对他们的捐赠预期也更高(Yuan et al., 2018)。在人口学变量上,与男性相比,女性展现出更高的捐赠行为,这可能是由于女性对受助者持有更高的共情水平(Sisco & Weber, 2019)。此外,已婚人士和城镇居民表现出较高捐赠行为。考虑到我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地区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较为成熟的慈善活动体系可能是捐赠行为存在城乡差距的潜在原因。

4.2 捐赠行为的时期效应

在时期效应上,中国民众捐赠行为在2010—2022年期间并非随着年份的推移单纯上升或下降。捐赠行为在2010—2014年间持续下降,于2016年之后逐步回升,直至2020年回升至高点,而后在2022年有所下滑。这一结果可能反映了所处时期捐赠环境的变化。首先,2008年汶川地震对中国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地震灾害激发了广泛的社会同情与援助意识,吸引更多人参与慈善捐赠,促进了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然而,在随后的几年中,捐赠行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该研究结果与高学德和马号云(2025)的研究发现相似,他们通过APC模型发现,2010—2013年间我国的普遍信任水平略有下降。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颁布成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节点。该法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慈善事业的管理迈入法制化阶段,增强了民众对慈善事业的信心。因此,2016—2020年间捐赠行为的回升可能反映了民众对慈善事业信任感的增强。此外,中国自2015年开始实施精准扶贫方略^①,指出精准化扶贫是解决贫困顽疾的必要措施,至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

面脱贫。在此期间,政府的号召、扶助政策和行为可能提高民众的扶贫捐赠意识,促使他们更积极地参与捐赠行为。我国民众捐赠行为于2022年略微下滑,这一结果与《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3)》相符。数据显示,与2020年相比,2022年我国社会捐赠金额减少了134亿元。结合《中国公众捐赠调研2023》的数据,捐赠者关注主题前二位分别为医疗救助与灾害救助。据此推测,这一变化可能与2022年处于新冠肺炎疫情末期存在一定关联,民众的捐赠行为逐步回落至疫情前的常态化水平。

为了探讨宏观经济变量与民众捐赠行为的时期效应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引入了人均GDP增量和基尼系数,并控制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研究结果显示,基尼系数与捐赠行为正相关,并使捐赠行为的时期趋势趋于平缓。这表明在较高经济不平等的时期,我国民众表现出积极的捐赠行为。该结果支持了不平等厌恶假说(Schröder & Neumayr, 2023; Yang & Konrath, 2023),并与过往部分研究相一致(Bielefeld et al., 2005; Mastromatteo & Russo, 2017)。例如,Payne和Smith(2015)基于加拿大1997—2006年期间的国民调查数据,发现基尼系数正向预测居民的捐赠行为。经济不平等可能强化捐赠者对捐赠行为的效用感知,从而促使其更愿意参与捐赠行为。然而,考虑到客观经济不平等和主观经济不平等之间存在差异,并非所有身处经济不平等区域的民众均能感知到相同水平的不平等(Schmalor & Heine, 2022),因此,我们需要谨慎解释这一结果。

4.3 捐赠行为的世代效应

生命历程理论(Alwin & McCammon, 2003; Elder, 1994)表明,个体的行为内嵌于所处的历史情境、社会文化和制度结构中,因此在分析世代效应时,需要从宏观视角考虑重大历史事件的作用。本研究的世代效应反映出中国独特历史事件烙印下的各个世代捐赠行为的特征。结果发现,在控制一系列人口学变量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后,民众捐赠行为的世代效应显著,呈现两个峰值和一个波谷,随后有回落的趋势。第一个峰值出现在出生于战争时期世代(二十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首先,根据社会比较理论,出生于战火纷飞、生活困顿的世代,由于亲历社会动荡与失序,更加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拥有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Yang & Lee, 2009),以及

^①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24-04-09 取自 https://www.gov.cn/xinwen/2015-12/07/content_5020963.htm

较低水平的焦虑 (Jiang, 2020)。因此,他们更愿意捐赠自己的钱物来帮助他人。其次,战争和社会动荡可能增强了这一世代的内群体认同 (Tajfel, 1982),即对自己所属的社群或国家有更强烈的认同感,更深厚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这种认同感可能会促使他们更多地为群体或国家的利益做出贡献,从而表现出更高的捐赠行为。

然而,捐赠行为的世代效应在三年困难时期出生世代中到达最低点。该研究结果与柳建坤和张云亮 (2021) 的结论并不一致。柳建坤和张云亮 (2021) 基于 CFPS 的 2010 年的横断数据发现,相比未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个体,童年时期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个体 (出生于 1947—1961 年) 更有可能进行日常捐赠,并为汶川地震捐款。而本研究在控制年龄效应和时期效应后,世代效应的结果表明,三年困难时期出生世代 (1958—1961 年) 的捐赠行为处于最低点。这一结果与生命史理论 (Del Giudice et al., 2015) 的观点相符,生命早期的不良经历会驱使个体采取“快策略”,追求即时满足,表现出更低的亲社会性和合作行为 (Wu et al., 2020)。因此,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的世代,可能因为年幼时经历了资源匮乏的困苦,感受到资源威胁,进而表现出更少的捐赠行为。随后,捐赠行为的世代效应逐步升高,并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生世代 (1978—1984 年) 达到第二个高峰。这一世代成长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其生活环境从贫困转变为较为富足、安全且自由。此后,1985—1991 年和 1992—2002 年出生世代的捐赠行为有所回落。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世代的成长阶段或成年初期遭遇过 2008 年金融危机。经济的不稳定以及成年初期遭遇的就业压力可能削弱了他们对慈善事业的参与意愿,从而表现出较低的捐赠行为 (Sambanis et al., 2022)。

4.4 研究优势、不足与展望

基于多期全国大样本调查的实证数据,本研究采用分层 APC 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揭示了我国民众捐赠行为在年龄、时期和世代维度上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有助于厘清社会宏观因素和个体微观因素与捐赠行为的关系。此外,本研究将生命历程理论应用至亲社会行为领域,同时考察了个体生命进程、时期社会因素与历史事件对捐赠行为的潜在作用,更清晰地呈现出捐赠行为在社会变迁中的动态变化趋势。本研究对于深入理解捐赠行为的本质,以及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与捐赠行为的关系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在新的视角下补充了相关领域

的实证证据。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不足,待未来研究进一步完善:(1) 本研究仅考察金钱与物品的捐赠行为这一现象,未能全面揭示我国民众不同类型捐赠行为 (如,志愿服务、献血、捐献器官等捐赠行为),以及其他亲社会行为的年龄、时期和世代变化的特征。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展研究范围,考察我国民众更广泛的亲社会行为在不同年龄、时期和世代之间的变化趋势;(2) 本研究并未直接测量历史事件对捐赠行为的影响,而是将历史事件发生时间与不同出生世代相对应,从而间接反映历史事件与出生世代的关系,因此无法探究因果关联。未来研究可采取纵向追踪的方法展开更深入的探讨,并与本研究结果进行交叉验证;(3) 十二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或许只是短暂的一瞬,本研究仅依据 CFPS 的 2010—2022 的调研数据,探究我国民众捐赠行为的年龄、时期、世代的变化效应,初步揭示了这十二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下的捐赠行为变迁状况和相关预测变量。我们呼吁未来研究基于更长时期的研究数据,更多样化的研究方法 (如,表征相似性分析、词嵌入技术),揭示社会变迁历程下捐赠行为的变化。

5 结论

(1) 我国民众捐赠行为的年龄效应呈倒“J”型趋势。在 18~100 岁个体中,捐赠行为在 18~40 岁年龄段中随年龄增长而增多,在 41~50 岁期间达到顶峰,而在 51~100 岁年龄段中随年龄增长逐渐减少。

(2) 时期效应表明,我国民众的捐赠行为在 2010—2014 年间呈下降趋势,于 2016—2020 年间呈上升趋势,而后在 2022 年有所下滑。

(3) 世代效应表明,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后,在 1912 年至 2002 年出生的世代群体中,捐赠行为呈现先下降再上升,随后有所回落的趋势。具体而言,1912—1926 年间出生的世代和 1978—1984 年间出生的世代分别呈现两个高峰,1958—1961 年间出生的世代处于低谷,而 1985—1991 年出生世代和 1992—2002 年出生世代的捐赠行为有所下降。

参考文献:

Alwin, D. F., & McCammon, R. J. (2003). Generations, cohorts, and social change. In Mortimer, J. T., Shanahan, M. J. (Eds.),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Springer, Boston, MA.

- Andreoni, J. (1990). Impure altruism and donations to public goods: A theory of warm-glow giving. *The Economic Journal*, 100(401), 464–477.
- Andreoni, J., Nikiforakis, N., & Stoop, J. (2021). Higher socioeconomic status does not predict decreased prosocial behavior in a field experiment. *Nature Communications*, 12(1), Article 4266.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1-24519-5>
- Bednall, T. C., Bove, L. L., Cheetham, A., & Murray, A. L. (2013).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antecedents of blood donation behavior and intention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96, 86–94.
- Bielefeld, W., Rooney, P., & Steinberg, K. (2005). How do need, capacity, 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fluence giving? In A. C. Brooks (Ed.), *Gifts of money in Americas communities* (pp. 127–158).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Chen, S., & Yang, S. (2024). Longitudinal changes in Chinese prosocial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Article 01461672231225367.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231225367>
- Côté, S., House, J., & Willer, R. (2015). High economic inequality leads higher-income individuals to be less generou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52), 15838–15843.
- de Bruin, W. B., & Ülqinaku, A. (2021). Effect of mortality salience on charitable donations: Evidence from a national sample. *Psychology and Aging*, 36(4), 415–420.
- Del Giudice, M., Gangestad, S. W., & Kaplan, H. S. (2015). Life history theory a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In D. M. Buss (Ed.),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2nd ed., pp. 88–114). New York, NY: Wiley.
- Duquette, N. J. (2018). Inequality and philanthropy: High-income g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7–2012.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70, 25–41.
- Elder, G. H. (1994). Time, human agency, and social change: 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7(1), 4–15.
- Elder, G. H., Johnson, M. K. J., & Crosnoe, R. (2003).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fe course theory. In J. T. Mortimer & M. J. Shanahan (Eds.),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Handbooks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Kluwer Academic/Plenum.
- Everett, J. A. C., Caviola, L., Kahane, G., Savulescu, J., & Faber, N. S. (2015). Doing good by doing nothing? The role of social norms in explaining default effects in altruistic contex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5(2), 230–241.
- Fehr, E., & Schmidt, K. M. (1999). 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3), 817–868.
- Ferguson, E., Lawrence, C., Bowen, S., Gemelli, C. N., Rozsa, A., Niekrasz, K., ... Davison, T. E. (2023). Warming up cool co-operators. *Nature Human Behaviour*, 7, 1917–1932.
- Freund, A. M., & Blanchard-Fields, F. (2014). Age-related differences in altruism across adulthood: Making personal financial gain versus contributing to the public goo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0(4), 1125–1136.
- Giving USA Foundation. (2021). *Giving USA: The annual report on philanthropy for the year 2020*. Retrieved March 12, 2024, from <https://givingusa.org>
- Gong, X., Zhang, F., & Fung, H. H. (2019). Are older adults more willing to donate? The roles of donation form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74(3), 440–448.
- Hu, A. (2015). A loosening tray of sand? Age, period, and cohort effects on generalized trust in Reform-Era China, 1990–2007.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51, 233–246.
- Jiang, J. (2020). Anx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of 2005–2013.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5(8), 1138–1152.
- Lin, F., Huang, Y., He, X., & Liu, Z. (2023). Research on the socioeconomic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voluntary, non-remunerated blood donation in China—A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based on data from 2012 to 2018. *Health Science Reports*, 6(7), Article e1341. <https://doi.org/10.1002/hsr2.1341>
- Mastromatteo, G., & Russo, F. F. (2017). Inequality and charity. *World Development*, 96, 136–144.
- Mayr, U., & Freund, A. M. (2020). Do we become more prosocial as we age, and, if so, wh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9, 248–254.
- Midlarsky, E., & Hannah, M. E. (1989). The generous elderly: Naturalistic studies of donations across the life span. *Psychology and Aging*, 4(3), 346–351.
- Piff, P. K., Kraus, M. W., Côté, S., Cheng, B. H., & Keltner, D. (2010). Having less, giving m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lass on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9(5), 771–784.
- Romano, A., Bortolotti, S., Hofmann, W., Praxmarer, M., & Sutter, M. (2021). Generosity and cooperation across the life span: A lab-in-the-field study. *Psychology and Aging*, 36(1), 108–118.
- Sambanis, N., Nikolova, E., & Schultz, A. (2022).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austerity on pro-sociality: Evidence from Greece.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23(4), 567–589.
- Schmalor, A., & Heine, S. J. (2022). The construct of subjective economic inequality.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3(1), 210–219.
- Schmukle, S. C., Korndörfer, M., & Egloff, B. (2019). No evidence that economic inequality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income on generos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6(20), 9790–9795.
- Schröder, J. M., & Neumayr, M. (2023). How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affects individuals' civic engagement: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empirical findings 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Socio-Economic Review*, 21(1), 665–694.
- Schulreich, S., Tusche, A., Kanske, P., & Schwabe, L. (2023). Higher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is linked to increased charitable giving and mentalizing-related neural value coding. *NeuroImage*, 279, Article 120315. <https://doi.org/10.1016/j.neuroimage.2023.120315>

- Settersten Jr, R. A. (2003). Age structuring and the rhythm of the life course. In Mortimer, J. T., Shanahan, M. J. (Eds.),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Springer, Boston, MA.
- Sisco, M. R., & Weber, E. U. (2019). Examining charitable giving in real - world online donations. *Nature Communications*, 10(1), Article 3968.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19-11852-z>
- Tajfel, H. (1982).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3(1), 1 - 39.
- Twenge, J. M., Campbell, W. K., & Freeman, E. C. (2012).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young adults' life goals, concern for others, and civic orientation, 1966 - 2009.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5), 1045 - 1062.
- Van Lange, P. A. M., De Bruin, E. M. N., Otten, W., & Joireman, J. A. (1997). Development of prosocial, individualistic, and competitive orientations: Theory and preliminary evid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4), 733 - 746.
- Wu, J., Guo, Z., Gao, X., & Kou, Y. (2020). The relations between early - life stress and risk, time, and prosocial preferences in adulthood: A meta - analytic review.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41(6), 557 - 572.
- Wu, Y., Xiao, H., & Wang, Y. (2023). Changing socialization values for children in China, 1990 - 2012.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55(3), 323 - 349.
- Xie, Y., & Zhou, X. (2014). Income inequality in today' s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1(19), 6928 - 6933.
- Yang, Y. (2008). Social inequalities in happ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2 to 2004: An age - period - cohort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3(2), 204 - 226.
- Yang, Y., & Konrath, S. (2023).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rosocial behaviour. *Nature Human Behaviour*, 7(11), 1899 - 1916.
- Yang, Y., & Land, K. C. (2006). A mixed models approach to the age - period - cohort analysis of repeated cross - section survey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data on trends in verbal test scores.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36(1), 75 - 97.
- Yang, Y., & Land, K. C. (2013). *Age - period - cohort analysis: New models, methods,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s*. Taylor & Francis.
- Yang, Y., & Lee, L. C. (2009). Sex and race disparities in health: Cohort variations in life course patterns. *Social Forces*, 87(4), 2093 - 2124.
- Yuan, M., Wu, J., & Kou, Y. (2018). Donors' social class and their prosocial reputation: Perceived authentic motivation as an underlying mechanism. *Social Psychology*, 49(4), 205 - 218.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23). *中国公众捐赠调研*.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24 - 02 - 28 取自 <https://www.nsd.pku.edu.cn/pub/chnsd/sylm/xw/533959.htm>
- 蔡华俭, 黄梓航, 林莉, 张明杨, 王潇欧, 朱慧珺, ... 敬一鸣. (2020). 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变化——心理学视野下的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8(10), 1599 - 1618.
- 蔡华俭, 张明杨, 包寒吴霜, 朱慧珺, 杨紫嫣, 程曦, ... 王梓西. (2023). 心理学视野下的社会变迁研究: 研究设计与分析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31(2), 159 - 172.
- 费孝通. (2019). *乡土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高海燕, 王鹏, 谭康荣. (2022). 中国民众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年龄—时期—世代效应的分析. *社会学研究*, 37(1), 156 - 178.
- 高学德, 马号云. (2025). 中国民众普遍信任的动态变迁——基于年龄 - 时期 - 世代效应的分析. *心理学报*, 57(3), 463 - 478.
- 胡洁. (2020). 市场化与当代中国民众的人际信任. *社会学评论*, 8(3), 90 - 104.
- 李婷, 宋健, 成天昇. (2020). 中国三代直系家庭变迁: 年龄、时期、队列视角的观察. *人口学刊*, 42(3), 5 - 17.
- 柳建坤, 张云亮. (2021). 童年时期灾害经历与个体捐赠行为——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社会发展研究*, 8(3), 152 - 171, 245.
- 南锐, 汪大海. (2013). 慈善环境对我国居民慈善捐赠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 1997—2011 年的数据分析. *当代财经*, 6, 34 - 42.
- 王俊秀, 刘洋洋. (2023). “均”与“寡”阶段性变动下中国居民公平感的变迁. *心理学报*, 55(3), 406 - 420.
- 辛志勇, 杜晓鹏, 辛自强. (2023). 中国公民财经素养与支出意愿的关系. *心理技术与应用*, 11(1), 1 - 18.
- 辛自强. (2019). 市场化与人际信任变迁. *心理科学进展*, 27(12), 1951 - 1966.
- 颜志强, 苏金龙, 苏彦捷. (2017). 共情的时代变迁: 一项横断历史元分析. *心理技术与应用*, 5(10), 578 - 585.
- 杨团, 朱健刚. (主编). (2022). *慈善蓝皮书: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202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
- 杨团, 朱健刚. (主编). (2023). *慈善蓝皮书: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202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
- 杨永娇, 史宇婷, 张东. (2019). 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代际效应——中国慈善捐赠本土研究的新探索. *社会学研究*, 34(1), 183 - 209 + 245.
- 苑明亮, 伍俊辉, 金淑娴, 林靛, 寇彧, Paul, A. M. V. L. (2024). 中国社会陌生人之间合作行为的变迁: 基于社会困境研究的元分析(1999 ~ 2019). *心理学报*, 56(9), 1159 - 1175.
- 钟毅平, 杨子鹿, 范伟. (2015). 自我—他人重叠对助人行为的影响: 观点采择的调节作用. *心理学报*, 47(8), 1050 - 1057.
- 朱健刚, 刘艺非. (2017). 中国家庭捐赠规模及影响因素探析. *中国人口科学*, 1, 47 - 58 + 127.

The Changes of Donation Behavior in China: An Age-period-cohort Effects Analysis (2010—2022)

WANG Linxin LIN Jing KOU Yu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National Demonstration Center for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As a crucial aspect of social capital, donation behavior is the typical prosocial behavior in which individuals voluntarily donate money, goods, or time to individuals, groups, or institutions in need. The current study utilized seven-wave data ($N = 76377$, 44.89% females; age range: 18 ~ 100 years old, $M_{age} = 52.85$ years old, $SD = 16.41$) based on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spanning from 2010 to 2022, including adult and household economic questionnaires. Employing hierarchical age-period-cohort-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s (HAPC-CCREM), the curr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trends in changes in Chinese donation behavior. Our results indicated: (1) Donation behavior exhibited an inverted J-shaped trend concerning age; (2) After controlling for 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variables, period effects revealed a U-shaped trend in donation behavior from 2010 to 2020, followed by a decline in 2022 in China; (3) Cohort effects revealed a V-shaped pattern in donation behavior among cohorts born between 1912 and 2002. In specific, two peaks were observed in the 1912—1926 Cohort and 1978—1984 Cohort, while the 1958—1961 Cohort was at the lowest point. Subsequently, there was a decline in donation behavior in the 1985—1991 Cohort and 1992—2002 Cohort.

Key words: donation behavior; social change; life course; age-period-cohort effect